

沙里宁的教诲

► 吴良镛

1948年，梁思成先生推荐我去美国匡溪艺院学习建筑与城市规划，这是由芬兰籍建筑师沙里宁所创办，集建筑与城市设计、综合设计、绘画、版画、雕塑、纺织设计、金属、工艺设计等于一体的艺术学院，还有匡溪附中、匡溪女子学校、匡溪博物馆、匡溪科学研究所等组成的学术文化中心。它散居于美国底特律城远郊的一片大树林和湖泊四周，风景绝美，建筑群均为沙里宁先后设计，既各具一格，又浑然一体，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。

沙里宁创办匡溪艺院的教育思想鲜明。第一，每个系都要延请一二位本领域的大师主持（曾有设音乐系之议，因为未得合适人选而罢）。建筑与城市设计由他本人执教。雕塑系由瑞典雕塑家卡尔米勒斯（Carl Millers）担任（他曾就学于罗丹之门，在匡溪有一约三层楼高可供巨大雕塑创作的工作室，家里客厅里的藏品丰富，俨然一座古代雕塑博物馆，年迈后，这些藏品捐赠给瑞典国家，现在斯特哥尔摩旧居中陈列，称为“米勒斯园”（Millers Garden），室外园地上陈列米氏

大型平生雕塑之复制品，面向大海，已成为斯城一景，为旅游参观之胜地）。美术系主任为匈牙利名画家石比雪，画室亦洋洋大观，俨然画廊，早期教师延请北欧艺术家居多，故颇具地区文化风格；第二，每个系招收学生不多，属于工作室制，师生各自从事创造性工作，不时交流切磋；第三，为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工作条件，每一个学生可以有一间屋大小工作场所，例如我在学习时就有4张大绘图桌，可以同时交叉作业，并随时利用空间从事模型制作；学生可以跨系选课，以促进对综合艺术的广泛理解，开阔学生视野，加强造型修养，如我当时即学习过雕塑和绘画，还有共同的人体速写；第四，匡溪有一很好的艺术博物馆和以艺术书籍为主的图书馆（也有不少中国艺术图书，在那里竟发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等）。

沙师的教导重在启发，反对教条式的教育，强调教师以自己对艺术真诚、创造性的追求，潜移默化影响学生。匡溪艺院除了一些如美术史的公共系列讲座外，并不以讲课为主，当然亦无固定教材。他并不鼓励学生死读书本，



吴良镛，我国著名建筑与城市规划学家。1922年生于江苏南京，1940年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，1948年入美国匡溪艺术学院作研究生。1950年底回国，历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、教授，副系主任、系主任，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，人居环境中心主任。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（后称院士），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所主持的“北京菊月胡同合院住宅工程”获1992年亚洲建筑师协会设计金奖和“世界人居奖”。

我在的时候，适逢沙师第二部著作《论形式的追求（Search for Form）》问世，他签上名，送每人一本，让学生自己去看，去想；他看见我桌上不时堆了不少书，并认真在读，提醒我：“你喜欢看书是好事，但要思考，要有自己的思想”，他欣赏具有一定思想见解的学生。他还强调“思想方法”（method of thinking）的重要性，我在当时是第一次听到，他不时指出一些理论与作者的创

作实践不符，分析作者思想方法上的混乱；他强调建筑应以人为本，要有人情味，他批评柯比西埃说的房屋是居住的机器，认为机器是工具，而房屋是与你朝夕相处的朋友，要亲切，适于居住，不能与机器同日而语。他鼓励学生要勤奋，他以自己的敬业精神，诚勉学生，我去美时，他已是76岁的老人，仍伏案作图，他眼睛不太好，青光眼动过手术，视野缩小了，看图的时候，如要用铅笔，就得伸手从铅笔盒中去摸，虽如此，仍坚持不懈……

沙师的要求甚严。每天早晨10时，他就通过一个小廊子从家中直接到我们工作室来，在每一个绘画台前转一圈。出成果的学生当然更能得到他的欣赏，鼓励有加，也常引导出更多的话题来，聆听者就获益更多。除了沙师的辅导外，一些美国内外知名的来访者，总被带到工作室来，向学生提问题，我在匡溪的两年多，见到不少建筑界的名人，如美国的B. Fuller，英国的P. Albercrombie，波兰的M. Nowiski，有时还有不同的代表团等。

他非常关心学生。我记得刚去不久，拿出带去的水彩画给他看，他很高兴，当时正好他的女儿女婿（亦知名建筑师、设计家）在匡溪博物馆举行个展，他亲自叮嘱有关方面，为我专辟一间举



小沙里宁（左），老沙里宁（中）

行我的水彩画个展，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画展（以后又陆续在美国不同城市开过两次）。沙师还以相当于当时水彩画最高的价格，购画两张，一直悬挂于他的工作室中，通过展览会，我的画被定购了十多张，当地的报纸亦发表艺术评论，予以肯定。甫人匡溪，对我的艺术追求予以肯定，并立即解决了我初去美国的生活紧张，从此我更安心学习（当然，也因此失去了一些自认为作于我国西南的较成功的作品，至今仍为憾事）。

对一个中国学生，他鼓励要研究、继承传统文化，当然也要研究现代西方文化。他热爱东方艺术，说这是一个宝库，但你要注意，不要失去东方的文化精神（可惜我对之知之不多）。匡溪的规定，学生毕业前，都要举行个展，当地的报纸将我的展品在文化版以整版的篇幅作了报道，并列出了沙师的评语如下：

在他的工作中，灌注了一种称之为中国现代性的精神。这种精神不仅来自于一般的人类文化发展，而且来自于中国实际生活的发展，一种新与旧的结合，基于中国自身的坚定不移的精神。

——伊利尔·沙里宁 1949年6月会见《底特律论坛报》记者的谈话

当时的我仅仅理解为一般的赞勉之辞，未加多想，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，重温旧事，回顾几十年来的道路，不就是在中与西、古与今矛盾中徘徊前进！具有远见卓识的导师却在我上学时期就一针见血地予以指出，大师睿智的魅力也在于此，而什么是中国现代性的精神，如何能从中国实际的发展中来发现、探索这种精神，时至今日，仍然是需要认真思考并严肃探讨的。

二

1950年夏，老人因心脏病突发，安然地坐在他儿子设计的有名的“沙里宁椅”（Saarinens's Chair）上，面带笑容，离开人世。不久，骨灰送往芬兰，举行国葬，并发行纪念邮票。

关于沙里宁学术思想，他有两本著作，都已在上世纪80年代由顾启源先生翻译并在国内出版，其实早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梁思成即在重庆《大公报》著文《论城市的体系与秩序》予以介绍，我亦为他的译著出版写过序。他是近代城市设计理论与教育的启蒙者，《城市设计》一书的作者E.培根就是他早期的学生；在建筑设计方面，成就最大的当属其子小沙里宁，盛名甚至盖过其父；他的一些合作与继任者都已成为当代国际驰名大师，如K. Roch、J. Dicknow、C. Pelli等。

1993年我去美国开会，顺便访问了匡溪，学校景色如旧，沙师精心设计的校园依然保护良好，他的旧居陈设一如他生前，已作

为参观点。原匡溪博物馆藏品甚丰，一度因学校财政拮据，匡溪基金会转让藏品，主要陈设沙里宁生平创作及匡溪馆藏作品等。旧地重游，50年前景象仿佛倒流回来，引起了一时的美好回忆，但又感到人去楼空，毕竟黯然失去了原有的光辉。

1998年，我去了盼望已久的芬兰赫尔辛基的沙翁故里，看到了该市城市规划介绍，仍然提及以1918年沙里宁对该城的规划为基础制定，赫城由许多岛屿与湖面、水曲与森林所分割，规划建设者将它们缀成一体，人文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，亲眼目睹，对沙师“有机疏散”“体形秩序”等学说有了更深、更形象的体会。1906年完成的赫尔辛基火车站是他的成名之作，至今仍是该城的标志和交通中心。我离开赫尔辛基的前一天下午，特去了郊外他的住宅赫维塔斯克（Hvittrask），在这里，规划、园林、建筑、雕塑、工艺美术、纺织、陶瓷艺术等结为一体，具有19世纪初“新艺术

运动”（Art Deco）的风格特征，我联想到在这里一时名人聚集，高尔基、芬兰作曲家塞伯利亚斯曾经是座上客，一些名建筑在这个绘图室里诞生，我仿佛在阅读着一本上世纪初建筑历史上的某些章节的实物插图。我理解了，赫维塔斯克为什么被称为“艺术之家”（the home as a work of art），我更了解了沙师把匡溪建成综合艺术学苑之来源。

在我离开这个湖水所环绕的住宅群前，前往距他家不太远的沙师湖边墓地，松林茂密，岩下湖水拍岸，在粗野磨岩石壁上，刻着他夫妇的名字，以及沙里宁的一句名言。归来途中，我浮想联翩，优秀的建筑就有这样的魅力，具有时代的印记，甚至能代表一个时代，一个有成就的建筑师就能分享到这种荣幸，当若干年后人们在拜谒他遗留下来的精心创作时，仍然理解并为它特有的建筑艺术语言所感动，这就是对他辛劳的最大慰藉。又当若干年后，甚至人们早已不知道这建



匡溪艺术学院



1950年，吴良镛在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布置毕业展览

筑的创作者是谁时，这完全不重要，因为这座建筑仍能为人们所欣赏，所感动，这就是不朽。

一个不朽的城市，会有它世世代代的创业史，有的遗物留存，有被毁掉了，并不断兴建起其他不朽的纪录，这就是建筑文化，这建筑文化又和其他的外来文化融会在一起，茁长出新的果实。这乡土上永远生生不息，聚居其上的人民，对他们的过去感到骄傲，对它的未来充满着创造者的信心，这就是伟大的文化力量之所在。

三

1993年，回访匡溪，对于绘画、雕塑等专业的发展未曾了解，但看到建筑系已从过去的系馆搬到匡溪中学的车库，不免感慨系之。1949年沙师尚在，即已开始思考接班教师问题，他物色



印有沙里宁形象的邮票

了波兰建筑师诺维斯基（Methew Nowiski），他系联合国大厦世纪委员会波兰代表（有若梁先生代表中国参加），后来即留在美国，夫人亦为波兰名建筑师，沙师特请他来匡溪作讲演，举办个人作品展，我见到他设计草图，才思敏捷，线条飞动，印象极深。他因在联合国一度与梁先生共事，亦和我谈起梁当时坚持该大厦南北朝向（梁先生曾对我说过），大家印象甚深。来匡溪之议诺氏本人亦同意，但匡溪基金会未能通过，只好作罢。后他受聘于印度规划昌迪加新城，已做了大量工作，惜死于开罗空难。此举世瞩目的庞大任务，后来才改请法国建筑师柯比西埃，诺氏的规划设计手稿杂志后有发表，可惜建筑师一般未注意及此。

1950年，沙师突然逝世，顿时后继乏人，有一度设计柏林犹太博物馆的 Libick 执教于匡溪，情况不详。对于匡溪建筑与城市规划设计系的兴衰，我亦有所感焉。其一，清华前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：“大学者，大师之谓也，

非大楼之谓也”，作为一个建筑工作者，我当然主张学校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，莘莘学子生活于此，有助于变化气质，陶冶性情，匡溪校园，美丽如昔，但人去楼空，说明更关键者在于大师的作用，有大师就能立一派之宗，可以发展繁荣学术。其二，一个学派可以因时代兴，开风气之先，发挥应有的影响。但学术之精华，影响所及，很快被人所吸收，而原学术单位必须日新又新，才能走在学术的前沿，否则不可能长久不衰，匡溪即如此。希腊学者道萨迪亚斯于上世纪60年代创“人类聚居学”，其“人类聚居研究中心”（Athen Ekistics）亦如此，曾云集世界学者达500人，极一时之盛。1976年联合国在温哥华召开的人居会议即为道氏所推动。自1975年道氏过世，“道氏帝国”渐趋没落。其三，对于学术的师承，中国有句成语：“薪尽火传”，这当然是最理想的境界，但要做到这一点，涉及因素甚多，至为困难，如继承者能承传先师之学术精神，并创造性地发展新思想新理论，有所作用于当代、社会，甚至青出于蓝，终必为社会所承认。相反，名义上承其衣钵，实际上抱残守缺，固步自封终必衰败。观匡溪艺术建筑系之变化盛衰，不能不有所感叹焉。

（本文摘自《吴良镛学术文化随笔》，2002年2月北京第一版）